

文献编



第一章 古籍丛书与中日文献交流

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古籍丛书的考究,同时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亦颇有兴趣。本章拟从数部影响较大的丛书入手,来探讨中日文献交流史上的有关问题。

清代鲍廷博辑、鲍志祖续辑的《知不足斋丛书》计 30 集,凡收书 207 种,是一部以精善著称的大型综合性丛书,在古籍丛书中占有重要地位。该丛书注意收录从东瀛传返故国的中土佚书。如皇侃的《论语义疏》,大概在南宋时国内已亡佚。康熙九年(1670),日本学者山井鼎在《七经孟子考文》一书中提及该国尚存是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新刻《论语集解义疏》在日本问世,随后传入中国,鲍氏即将其刊入丛书。《论语集解义疏》“犹唐以来相传旧笈,经义注义多与今本不同,颇足以资考证,邢疏即从是疏而出,而不及是疏之犹存古义,故好古之士,多舍邢而从皇焉”^①。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知不足斋丛书》的刻印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年。当时正在陆续刊布的鲍氏丛书迅速东渡扶桑,受到彼邦人士的关注和重视。东瀛学者热诚盼望他们所搜集整理的中土佚书,能够西传华夏并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以广其传。日本学者冈田挺之将其从《群书治要》中搜辑到的残缺不全的《孝经郑注》稍加补辑,于 1793 年刊刻行世。冈田挺之云:

顷者读《知不足斋丛书》所载《古文孝经》鲍、卢诸家序跋,乃知唯得《孔传》,未得《郑注》,瀛海之西其佚已久。呜呼!书之灾厄,不独水火,靳秘之甚,其极有至泯灭者,岂不悲乎?今刻是本,予之志在传诸瀛海之西,与天下之人共之。家置数通,人挟一本,读之诵之,则圣人之道由是而弘,悠久无穷。海舶之载而西者,保其无恙,冀赖神明护持之力。鲍、

^①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 页。

卢诸家得是本,再附剞劂,则流传遍于寰宇,当我世见其收在丛书中,所翹跂以俟之也。^①

鲍廷博获取《孝经郑注》后,果然将其收录于《知不足斋丛书》第21集,实现了东邻学者的夙愿。又如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传到日本后,彼邦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唐诗)尚逸而在吾日本亦不为鲜也。当时遣唐之使、留学之生,与彼其墨客韵士肩相比、臂相抵,则其研唱嘉藻,记其所口,誊其所记,装以归者,盖比比不已。大江维时之千载佳句,的的珠玑,获其片而逸其全。”^②日本学者上毛河世宁有慨于此,乃多方搜求,遂成《全唐诗逸》一书。斯书后由鲍廷博之子鲍志祖刊入丛书的最后一集中。可见中日双方学者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代典籍方面有着共同的心愿与切实的行动。《全唐诗逸》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流布甚广的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即将该书附录于后。它如丛书中收录的《古文孝经孔氏传》等,亦颇具参考价值。此乃《知不足斋丛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后人对该丛书给予高度评价的重要缘由之一。

《四库全书》乃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至远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引人注目的是,《四库全书》收录了来自10个国家的22部外籍人士之著述,其中日本学者两部,即《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日本]山井鼎撰,[日本]物观补遗)和《古文孝经孔氏传》附《宋本古文孝经》(旧题汉·孔安国撰,[日本]太宰纯音)。另有一种经过日本学者校订的著作,即《论语集解义疏》(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日本]根本逊志校订)。这在中国官修书中尚属首次。《七经孟子考文》的内容,系依据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宋版《五经正义》,当地古博士家所传的钞本,以及明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各朝所刊的《十三经注疏》等,相互参校,将各本的异同和疑点分为考异、补阙、补脱、正误、谨案、存旧等数类,并详加记述,但是“惟能详纪同异,未敢决择是非”^③。因为该书据以校勘的许多古籍在中土佚失已久,所以该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颇受中国学者青睐。清代大学者阮元于嘉庆年间主持编写《十三经注疏

① [日]冈田挺之:《郑注孝经序》,载《知不足斋丛书》第21集,清乾隆道光间长塘鲍氏刻本。

② [日]淡海竺常:《全唐诗逸序》,载《知不足斋丛书》第30集,清乾隆道光间长塘鲍氏刻本。

③ (清)阮元:《擘经室集·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页。

校勘记》时，即参考了《七经孟子考文》，同时在嘉庆二年（1797）刊印了此书，并在所作序中盛赞山井鼎等“有功圣经，亦可嘉矣”。

清代嘉庆年间，阮元悉心搜求四库未收之书 160 余种进呈，被赐名为《宛委别藏》。《宛委别藏》所收多属珍贵稀见之本，其中有 7 种是已失传于中国、却保存在日本的佚书，即《泰轩易传》、《乐书要录》、《难经集注》、《五行大义》、《群书治要》、《臣轨》、《玉堂类稿》。此乃阮元对中日典籍交流的一大贡献。

日本学者林衡（又名林述斋）所辑的《佚存丛书》，凡分六帙，共计收书 17 种。卷首载林氏自序，曰：

欧阳永叔《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时经未焚，佚书百篇今尚存。”然所谓百篇之书，我无有之，则不知其何据，岂臆度言之耶？……余尝读唐宋已还之书，乃识载籍之佚于彼者不为尠也。因念其独存于我者，而我或致遂佚，则天地间无复其书矣。不已可惜乎！于是汇为一编，姑假诸欧诗，名曰《佚存丛书》。

是书系用活字镂版印行，历彼国宽政、享和、文化三朝（约当清代嘉庆年间）始成，所采以罕觐者为准，如皇侃《论语义疏》、魏徵《群书治要》之属，虽久遗逸，然已版行，故不复列入，选择颇为精审。每书之后皆附编者题跋，述其藏弃、刊刻源流。

《佚存丛书》采辑之书，皆系中土久佚且无刊本之珍籍。如对列为斯集之首的《古文孝经》（孔安国传），尤炳奎在《重刊古文孝经说》中指出：“惟日本《佚存丛书》中有之，余虽见于《知不足斋丛书》中，然其稿亦从日本得来，而古字已悉改为近体矣。”足见其价值所在。又如隋萧吉撰的《五行大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可见此书在华夏散失已久，而千年之后居然完善地保存于日本并被收入《佚存丛书》，诚乃不幸中之大幸。《五行大义》“文章醇古，非复唐以下所能为。而其所援证，往往有佚亡之书今不可得见者。且萧以阴阳算术著称，见其本传，则此书之出萧手万无一疑”^①。此书值得我们珍视。再如唐武则天敕

① [日]林衡：《题五行大义后》，载《佚存丛书》第 1 帙，商务印书馆据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至文化七年（1810）活字本（即原本）影印，1924 年。

撰、元万顷等参修的《乐书要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卷，《宋史·艺文志》即未见载，可见阙佚已久。因年代邈远，是编在东瀛亦遗亡过半，《佚存丛书》本《乐书要录》“仅存第五、第六、第七三卷。其中所引古籍，如《月令章句》、《五经通义》、《三礼义宗》、信都芳删注《乐书》、苏夔《乐志》，皆世所罕觐，未尝不藉是以存其崖略”^①。书中所论管弦三分损益法，左、右旋宫法和后附“十二律相生图”，均系考究古代乐律理论的重要参考文献。它如斯集中所收的《臣轨》、《两京新记》、《李峤杂咏》、《文馆词林》、《文公朱先生感兴诗》、《武夷棹歌》、《泰轩易传》、《左氏蒙求》、《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一名《难经集注》）、《蒙求》、《崔舍人玉堂类稿》、《西垣类稿》、《周易新讲义》等中土逸书，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地理及医学等诸多学科，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佚存丛书》中所收的《唐才子传》，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

考杨士奇《东里集》有是书《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乐大典目录》于“传”字韵内载其全书。今“传”字一韵适佚，世间遂无传本，然幸其各韵之内尚杂引其文。今随条摭拾，裒辑编次，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七十八人。^②

所以《四库全书》中的《永乐大典》本《唐才子传》八卷，已非原书足本，并且多有脱漏。而《佚存丛书》本《唐才子传》乃十卷足本，共计 278 篇，叙写 278 位唐代诗人传略，附叙 120 人，总为 398 人。而其所依据的日本五山版系翻雕元槧之本，字画精整，纰缪极少，故其质量远在《四库》本之上。古典文学出版社于 1956 年出版的《唐才子传》，所据即为《佚存丛书》中的十卷足本。该丛书中的《宋景文公集》亦复如是。《佚存丛书》西传中国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上文论及的阮元所辑的《宛委别藏》，即收有《佚存丛书》中的 10 种书。此外，清代后期伍崇曜辑刻的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粤雅堂丛书》，亦将《佚存丛书》中的大部分书收列其中，并成为该丛书的显著特色之一。由于《佚存丛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光绪八年

①（清）阮元：《擘经室外集》，载（清）阮元：《擘经室集》，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218 页。

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523 页。

(1882)沪上黄氏又将是书用木活字重新排印,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又据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至文化七年(1810)活字本(即原本)影印出版,以广流布。

晚清光绪年间黎庶昌和杨守敬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在中日典籍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逸丛书》共收书26种,凡200卷;内中既有在渊源所自的本土久已失传的佚书,也有多种东邻收藏而国内罕见的隋唐写本与宋元刻本,同时还有日本剽削的中国典册和彼邦汉籍。《古逸丛书》中的影宋蜀大字本《尔雅》,是现存《尔雅》单注本中一个较早的本子,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覆正平本《论语集解》乃日本刊刻的中国典籍,在版本学和校勘学上有着重要价值;覆元至正本《易程传》为吕祖谦参定之本,其价值尤为突出,而覆元至正本《系辞精义》虽系伪托之书,但仍可资参考;影宋本《庄子注疏》亦颇珍贵;覆宋本重修《广韵》和覆元泰定本《广韵》,为考究《广韵》的版本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据,在音韵学和校勘学上亦很有参考价值。更引人青睐的是,《古逸丛书》还收录了多种在中土失传已久的逸书。影旧钞卷子原本《玉篇》零本乃此中瑰宝。原本《玉篇》是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正体的字书,释义完备,例证丰富,词义不明的,还有顾野王按语,并赖以保存了多种亡逸已久之书,宜倍加珍视。《文馆词林》是唐人编纂的一部千卷总集,宋初已在我国绝迹,而流传至日本的《文馆词林》却有一些残卷保存至今。《古逸丛书》即收有影旧钞卷子本《文馆词林》残本十三卷半,内中甚多在华夏故土已经失传的先唐和初唐遗文,可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全唐文》之不足。《姓解》大约于元末明初时已在国内亡佚,所以弥足珍贵。《韵镜》是现存韵图中最古老的一种,至今仍是音韵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宋高似孙所撰《史略》可以视为一部独立的历史书籍专科学目,在国内久已湮没无闻,收入《古逸丛书》之影宋本《史略》系海内孤本,堪称墨林星凤。影宋本《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实为唐宋史地研究的重要资料。《古逸丛书》内还收有一种日本汉籍,即影旧钞卷子本《日本国见在书目》。该目录对于古文献学尤其是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日本刊刻的集唐字《老子注》和仿唐石经体写本《急就篇》,我们可从中探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流播于日本之踪迹。《古逸丛书》对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都有很大参考价值,直至今日,仍在古籍整理研究工

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清代傅云龙所辑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在日本东京刊刻的《纂喜庐丛书》,卷帙虽然较少,但所收多为宋元旧刊且是中土已佚者,故亦值得提出。其中的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补辑一卷,堪称中日典籍交流史上的典范之一。《新修本草》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乃世界上第一部以政府的名义和力量编写并颁行的国家药典,较之西方最早的国家药典,即159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要早九百余年。《新修本草》公布后,不但风行全国,并且很快通过日本遣唐使携归东瀛。然而,这部珍贵的医学著作在北宋元祐年间便已失传于中土,令人遗憾。值得欣慰的是,傅云龙在游历日本时,经过多方搜求,终于寻访到这部在中国湮没了近千年的本草学要籍的残卷,并将其刻入《纂喜庐丛书》。诚如傅氏所云:“是书修后三百余年而佚,佚后一千余年,而云龙乃以日本之不绝如缕者刊之,藉彼守残,聊增輶采,未始不与重九译致殊俗相表里也,亦游历责也。”^②它如该丛书所收的唐卷子本《论语》、日本延喜本《文选》第五残卷、景唐刊卷子本《陶文》残卷等^③,也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清代光绪年间王锡祺所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分成初编、补编、再补编,每编各为十二帙,共计收书1450种。《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收录了多种有关日本史地的著作,其中29种系中国人所撰,如陈其元的《日本近事记》、王韬的《日本通中国考》、何如璋的《使东述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黎庶昌的《游日光山记》、傅云龙的《日本风俗》、黄庆澄的《东游日记》等。此外尚有多种著作在部分篇幅中论及日本。上述诸书内不乏亲身经历的见闻记录。同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还汇集了域外学者的著作75种,其中出自日人之手的达29种,如冈千仞的《观光纪游》、太宰纯的《登富岳记》、释大曲的《游石山记》、市村谦的《游天王山记》、冈本监辅的《印度风俗记》和《亚美理驾诸国

① 参见陈东辉:《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及其文献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② (清)傅云龙:《游历日本国经余记》后编,清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③ 严绍璁指出,后两种书并非刊刻于日本平安初期,而是江户时代的贋品。(参见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26页。)笔者以为,这两种书虽系贋品,但仍有其参考价值。

记》、村田某的《古巴述略》等。^①这些著作,大大开阔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并且为地理、历史、民俗、文学、中外关系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1928年,近现代大出版家和著名学者张元济曾东渡访书,收获甚丰。^②张氏从日本搜求回国的珍本秘籍,有多种被收入《四部丛刊》续编和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大型古籍丛书。

张氏从东瀛访得之书收入《四部丛刊》续编和三编的共计7种。其中的《太平御览》颇具代表性。《丛刊》三编中的影印《太平御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衲本”。张元济谓:

岁戊辰,余赴日本访书,先至静嘉堂文库观所得陆氏本,其文渊阁印灿然溢目,琳琅满架,且于己国增得如干卷,为之欣美者不置。嗣复于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获见宋蜀刻本,虽各有残佚,然视陆氏所得为赢。因乞假影印,主者慨然允诺,凡得目录十五卷,正书九百四十五卷;又于静嘉堂文库补卷第四十二至六十一,第一百十七至一百二十五。此二十九卷者,均半叶十三行,同于蜀刻,惟板心无刻工姓名,且每行悉二十二字,与蜀刻之偶有盈缩者不同,疑即在前之建宁刊本。……日本文久纪元,当我国咸丰十一年,喜多村直宽尝以影宋写本,用聚珍版印行,其优于鲍本者,则板心所记刻工姓名,均与蜀本相合,且上文所举四事,一无脱误。宋刻而外,断推此本,于是取以补复印件二十六卷之阙。^③

张元济经过努力搜求与认真考辨,用最早和最佳的几个版本拼合成为一部完整的巨编,使《四部丛刊》本《太平御览》成为迄今为止最接近原貌的良本,向为学界所重。1960年以来中华书局多次影印出版《太平御览》,所用底本即为上面这个本子。它如收入《四部丛刊》续编的《东莱先生诗集》,系张元济向日本内阁文库借影的宋乾道刊本,是书已久佚于华夏故土。张氏之所以采用这

① 参见王勇:《〈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其所辑域外典籍——“华刻本”初探之一》,载《日本文化研究》第1期,日本CN企画出版部1994年版。

② 参见陈东辉:《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③ 张元济著,顾廷龙编:《涉园序跋集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6—187页。

个本子,是因为将其与涵芬楼旧藏之陈仲鱼钞本互校,发现后者脱漏、讹误之处甚多,其它传本则更靠不住了,自以此本为最宜。再如《四部丛刊》续编中的《群经音辨》,系毛氏汲古阁影写南宋宁化县学重镌临安府学覆监本,源出北宋,书中佳处见于陆心源《仪顾堂题跋》者已有五十余条之多。张元济以泽存堂本覆勘之,发现其书佳处不见于陆跋者尚不胜数,因而得知世本尽祖泽存,承讹袭谬久矣,于是深感版本之得失,若是其重。由于岩崎氏的不吝一瓠之赐,使《四部丛刊》喜添一部难得的善本。借影自日本图书寮的《山谷外集诗注》,虽然是元至元乙酉建安重雕蜀本,但由于蜀本毁于宋世,当时传本已罕,而此本为元初翻刻,世无人知,字画缜密,可与宋本媲美,并且书中文字足以订正当时通行的十七卷本之讹异者甚多,故亦将其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以弥中土书林之缺憾。此外,《四部丛刊》中收录的宋本《说文解字》,原系归安陆心源所藏宋楼旧藏,当时是由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叶德辉通过白岩子云龙平从日本静嘉堂文库借来这部珍稀之本的。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四部丛刊》预定书目刊出后,引起东瀛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日本著名学者神田喜一郎、武内义雄等纷纷撰文,既给予充分肯定,又提出了许多足资参考的宝贵意见。如神田喜一郎认为:

《四部丛刊》之刊行,实为有裨学界之壮举。吾辈学生,无不同感此福音。今读其预定书目,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书籍,已网罗俱尽。其选择底本,亦尚为适当。虽然,论吾辈得院望蜀之愿,则如此巨构,于底本之选择,尤宜格外注意。如《群书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犹未周。《弘明集》、《广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径山寺本,稍稍近似,实则当用高丽藏本。《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亦未为美善,是应用日本图书馆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杨诚斋集》为缪氏艺风堂影宋写本,想由日本图书馆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写而来,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为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为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孙巨源原本之九卷为佳。又未确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经传集解》之拟用翻宋本,实不及日本图书馆宋嘉定丙子闻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记》拟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学丛书本。《荀子》拟用明世德堂本,不

知何因。与其用此，宁用《古逸丛书》之宋台州本。《范德机诗集》拟用明刊本，则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为较佳。^①

神田氏之评论，多切中《四部丛刊》采用底本之失。由此可见，中日之间的典籍和学术交流，对于促进包括丛书编纂在内的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在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张元济将从扶桑借影的宋刊本《三国志》、《陈书》、《新唐书》等与其它有关版本相补配，力求恢复古籍原貌。在 1928 年张元济访日前，《三国志》已经用元刊本摄影，然校以衢州本，发现讹误滋甚，后张元济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访得宋绍熙刊本，便据以影印，所缺《魏书》三卷则以涵芬楼所藏宋绍兴刊本配补。百衲本的《陈书》采用著名的宋眉山刊本《七史》之一，但当时北平图书馆的藏本仅存二十一卷，后经张元济用影自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同式版本补配，终于使该书无一明修版，可与宋代原刻媲美。张元济从静嘉堂文库将旧藏宋嘉祐刊小字本《新唐书》乞照携归，补以经过数年搜访而得来的北平图书馆、商丘宋氏及刘氏嘉业堂所藏其它宋本，终于缀合成一部完整的高质量宋刻。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以一直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称道的原因。另外，张元济访自静嘉堂文库的宋刊本《武经七书》，亦于 1935 年作为《续古逸丛书》之一种影印问世。

另如《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辑）、《国学基本丛书》（商务印书馆辑）、《国学小丛书》（王云五主编）、《国学丛刊》（正中书局辑）、《函海》（李调元辑）、《榕园丛书》（张丙炎辑、张允顼重辑）、《文选楼丛书》（阮亨辑）、《昭代丛书》（张潮、张渐辑、杨复吉、沈琳德续辑）、《滂喜斋丛书》（潘祖荫辑）、《豫恕堂丛书》（沈登善辑）、《反约篇》（李光廷辑）、《今古文孝经汇刻》（王德瑛辑）、《吉石庵丛书》（罗振玉辑）、《殷礼在斯堂丛书》（罗振玉辑）、《雪堂丛刻》（罗振玉辑）、《云窗丛刻》（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罗振玉辑）、《嘉草轩丛书》（罗振玉辑）、《辽海丛书》（金毓黻辑）、《诵芬室丛刊》（董康辑）、《小学钩沉

① [日]神田喜一郎：《论四部丛书之选择底本》，日本《支那学》第 1 卷 4 号（1920 年 12 月）。转引自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载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9 页。

续编》(顾震福辑)、《渐学庐丛书第一集》(胡祥鏊辑)、《申报馆丛书》(尊经阁主辑)、《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徐维则辑)、《郑开阳杂著》(郑若曾撰)、《柳堂师友诗录初编》(李长荣辑)、《销夏录旧》(管庭芬辑)、《古代铭刻汇考四种》(郭沫若撰)、《古今杂剧》(佚名氏辑)、《美术丛书》(邓实辑)、《皇汉医学丛书》(陈存仁辑)、《中国医学大成》(曹炳章辑)、《珍本医书集成》(裘庆元辑)、《三三医书》(裘庆元辑)、《国医小丛书》(国医书局辑)、《古本医学丛刊》(张赞臣辑)、《中外医书八种合刻》(佚名氏辑)、《回澜社医书一辑》(汪绍达辑)、《张氏医书七种》(张璐、张登撰)、《伤寒大成》(张璐等撰)、《白芙堂算学丛书》(丁取忠辑)、《王香园近世丛书》(日本加藤渊辑)、《萃雪轩丛书》(日本近藤元粹辑)、《昌平丛书》(日本富田铁之助辑)、《小四海堂丛书》(日本羽仓则辑)、《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日本早稻田大学编辑部辑)、《敦煌遗书第一集》(日本羽田亨辑)、《容安轩旧书四种》(日本神田信畅辑)、《满蒙丛书》(日本内藤虎次郎辑)、《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日本神田喜一郎辑)、《八史经籍志》(日本佚名氏辑)、《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唐钞本》(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辑)等古籍丛书,亦程度不等地涉及有关中日文献交流的内容,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同时,近数十年来海内外出版的古籍丛书中,也有多种反映了中日两国的文献交流。中国出版的古籍丛书,如大陆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古逸丛书三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台湾地区的艺文印书馆出版的《无求备斋老列庄论孟集成》、《百部丛书集成》,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集成新编》,广文书局出版的《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书》和《书目丛编》,弘道文化公司出版的《诗话丛刊》,大华印书馆出版的《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新兴书局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学生书局出版的《善本戏曲丛刊》,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日本出版的古籍丛书,如汲古书院出版的《和刻本经书集成》、《和刻本正史》、《和刻本诸子大成》、《和刻本类书集成》^①、《和刻本汉诗集成》、《和刻本汉诗集成总集编》、《和刻本汉籍文集》、《和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90年据汲古书院影印本予以重印。

刻本汉籍随笔集》、《和刻本辞书字典集成》、《古辞义音义集成》、《唐话辞书类集》、《明清俗语辞书集成》、《汉语文典丛书》、《日本书目大成》、《和刻本明清资料集》、《中国秘籍丛刊》、《足利学校秘籍丛刊》、《古典研究会丛书》,集英社出版的《汉诗大系》、《全释汉文大系》,有朋堂出版的《汉文丛书》,富山房出版的《汉文大系》,明治书院出版的《新释汉文大系》,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的《国译汉文大系》,东洋文化协会出版的《全译中国文学大系》,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中国古典文学大系》,明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新书》,学习研究社出版的《中国的古典》,朝日新闻社出版的《中国古典选》,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诗人选集》,京都大学出版的《汉籍善本丛书》等,辑了大量保存于日本的中国典籍和日版汉籍,于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工作都甚有裨益。其中的《无求备斋老列庄论孟集成》可谓“丛书之丛书”,包括《老子集成初编》、《老子集成续编》、《列子集成》、《庄子集成初编》、《庄子集成续编》、《论语集成》、《孟子十书》等七种“子丛书”,共计收录 686 种著作,内有日本汉籍 128 种。如《奈良圣语藏老子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集解》(西埜直方撰)、《老子说》(石田羊一郎撰)、《列子考证附引证》(大田敦撰)、《论语古训正文》(太宰纯撰)、《论语集解考异》(吉田汉官撰)、《正平本论语札记》(市野光彦撰)等,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先秦文献、中国学术思想史、日本汉学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颇有助益,值得珍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辑集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①,系从日本公私庋藏的中国古籍中精选有关书籍 20 种汇编而成。《明清俗语辞书集成》所收的各种刻本中,有稀见的善本,即使属晚清刻本,亦大多是流传不广的私家刻本或仿刻本,明清以降的版本目录书中也罕见著录。为了使国内有关学者有机会利用这部极有价值的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9 年影印出版了该书。在影印之前,对其中佚名的明刊本《目前集》,觅得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明赵南星撰《味檠斋遗书》,此书系清光绪中高邑赵氏刊本,其中《目前集》的卷目及版本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一致,盖光绪时用明旧雕版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乃据以补齐《题词》和残页,对版面不清者亦大多予以更换。同时,又据《中国丛书综录》多处著录及《味檠斋遗书》,

① 日本汲古书院 1974 年版。

确认《目前集》作者系明人赵南星。再则,《通俗常言疏证》亦以较清晰的同一版本对各卷文字模糊者抽换 60 余页。它如《里语征实》、《直语补证》等书的个别地方,也参照同类藏本作修补。此外,为了便于查检,书末增附了四角号码索引。笔者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汲古书院版《明清俗语辞书集成》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通过交流与合作,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相得益彰,同受沾溉,其促进双方汉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之功为两国学人所共庆。这种中日之间文献交流的方式,是很值得提倡的。

再则,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更趋频繁和深入,大量中国古籍丛书及《中国丛书综录》^①、《中国丛书综录补正》^②、《中国丛书广录》^③、《中国丛书综录续编》^④、《中国丛书知见录》^⑤、《中国丛书题识》^⑥、《丛书大辞典》^⑦、《丛书总目续编》^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书部》^⑨、《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⑩、《四库全书总目》^⑪、《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⑫、《续修四库全书提要》^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⑮、《四部丛刊书录》^⑯、《四部备要书目提要》^⑰、《丛书集成初编目录》^⑱、《丛书集成初编总目索

① 中华书局 1959—1962 年版。该书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新 1 版。

②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 年版。

③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

⑤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

⑥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

⑦ 辞典馆 1936 年版。

⑧ 台湾德浩书局 1974 年版。

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⑩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⑪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⑫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⑬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1973 年版。

⑭ 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⑮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年版。

⑯ 商务印书馆 1920—1922 年版。

⑰ 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⑱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引》^①、《〈丛书集成续编〉总目》^②等有关丛书的工具书在日本文献学术界广为流布,发挥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日本历代刊印的汉籍丛书,也通过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西传中国,它们的重要价值已日益为广大中外学者所认识,目前国内有多家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图书资料部门将它们作为重要文献加以采集和皮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正在积极编纂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接主持的重大项目《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丛书卷》^③,在“编例”中规定:“日本等国编刊的中国综合性古籍丛书,择其流传于中国者收录。”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续修四库全书》^④,经有关学者提议,已经将中土稀见或不见流传的和刻本汉籍收入该丛书。《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和《续修四库全书》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文化工程,编纂者的上述主张,将为中日文献交流谱写新的宏丽篇章,并将在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古籍丛书在历代文化典籍的保存与流传中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就上述涉及中日典籍交流的古籍丛书而言,其重要价值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历史上,这些丛书扩大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文教学术交流,内中一些丛书还起到了传播近现代新知识的作用。上述古籍丛书还有助于我们对汉文化加以整体研究,并为汉字文化圈观念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其意义不容低估。仅就古文献学领域而言,这类丛书在历代的古籍校勘、辨伪、辑佚及目录版本考订中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多方面的贡献,至今仍系古籍整理及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① 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②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年版。

③ 该书后更名为《中国古代著名丛书提要》,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2015 年出版。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2 年版。

第二章 《古逸丛书》与中日文献交流

在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关系史上,书籍的交流无疑是其中繁富而灿烂的篇章。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与绚丽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突出象征的汉籍,曾经源源不断地传向东邻日本,对彼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事的变迁,部分东传汉籍已在中土逸失,但却被保存于日本。嗣后,尤其是在近现代,这些“佚书”逐渐为东渡扶桑的中国学人惊喜地发现,视为至宝,便以摹刻、抄录方式(现代则还可摄制或复印)将其传返故土,日方学者谓之“逆输出”。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课题,不但可以拓展中日汉籍交涉史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研究中国文献学史和当今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亦颇具参考价值。

晚清光绪年间从日本辑刻的著名的《古逸丛书》,即收有许多来自扶桑的中土佚书。担任《古逸丛书》的搜辑、编校和刊刻工作的,是黎庶昌和杨守敬。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光绪间曾两次出任驻日公使,前后共六年。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又作星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乃著名的历史地理和版本目录学家。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应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埔人)之邀,赴日任使馆参赞,及至东京,何如璋它调,继任者许景澄旋丁忧离职,由黎庶昌接替。杨氏初到日本时,曾得到当时任驻日使馆参赞的著名学者黄遵宪的指点,从而获悉日本有许多唐钞宋刻等中土珍本。守敬于是日游市上,访得许多旧本。其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讲求新学,唾弃旧学,故家所藏汉籍竟有作为废纸出售者。杨氏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曾详记其事云:

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板尚不甚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本亦视为秘籍,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

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之视为奇货，固余所厚望也。^①

值得一提的是，杨守敬曾以重价购得日本学者涩江全善、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抄本，不久又与森立之相识，成为好友。杨氏即以《经籍访古志》为线索，按目求书。在搜访中，凡能购到之书，杨氏总是不惜血本，遇有不能以金币购得者，则常常用从中国携去的汉魏六朝金石碑版及古钱、古印等与日人交换。由于杨氏的刻意搜求，所获颇丰，未及一年，购得古籍即达三万余卷之多，其中有为森立之原书所不载者数百种。

黎庶昌是桐城派后期著名文学家，影响甚广的《续古文辞类纂》即为其所编刻。他曾出使英、法、德、美等国，因而视野开阔，见闻广博。黎氏幼年受到其乡贤郑珍的学风的熏染，于典籍颇感兴趣。他出任驻日公使后，便大力支持杨守敬搜访古籍的工作。守敬曾手拟了一篇《日本访书缘起条例》，黎氏阅后大为感动，且引起兴趣，遂萌发辑刻《古逸丛书》之雅意，委守敬主其事。

从光绪八年(1882)至十年(1884)，杨守敬大力协助黎庶昌编刻《古逸丛书》。守敬在工作中竭尽全力，认真细致，对刻工要求极严，每镌一书，必先挑出版刻技艺最佳者作为准绳，要求其余工人依其笔法精心削刻。由于杨氏对版刻富有卓识，鉴别入微，东瀛之士深表钦佩，诧为异人。《古逸丛书》刻印精湛，传至苏州，潘祖荫、李鸿裔等见到后，惊叹欲绝，认为这样的刻板乃两宋以后所未睹，清代诸家的仿刻本，俱不足与之相比。诚如叶昌炽所赞，《古逸丛书》“哀然巨帙，摹勒精审，毫发不爽。初印皆用日本皮纸，洁白如玉，墨如点漆，醉心悦目”^②。陈矩则认为其书“无美不备，宜海内有洛阳纸贵之誉也……数百年后，好古者必更有孔庙、虞书、贞观刻之叹”^③。此书东京初印美浓纸本，尤为学林所重，几与宋槧元刊等视，黎氏以之赠送当时显贵，皆惊为精绝；另有光绪中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影刊本。黎庶昌任满归国时，将这部丛书的全部板片带回，交与江苏官书局，受到国人重视，然其摹印远不如前。由于

①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载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清)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卷七《黎庶昌莼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09页。

③ (清)陈矩：《东游文稿·记遵义黎莼斋先生刊古逸丛书》，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